

·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 ·

社会责任规制会抑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

肖红军¹ 程俊杰^{1,2} 黄速建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2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区域现代化研究院, 南京 210004)

摘要: 本文从成本驱动视角研究了社会责任规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与机制。通过构建理论框架和利用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 包括经济自由度、反腐、劳动者福利保障、环境规制四个方面在内的社会责任规制促进了 FDI 流入。但这一结论在不同国家类型, 如大国、小国、沿海国家、高收入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进一步从总体上看, 社会责任规制程度的提高抑制了制造业 FDI 的流入, 但却有助于促进服务业 FDI 的流入。本文得到的启示是, 我国可以通过优化社会责任规制来扩大 FDI 规模、优化 FDI 结构, 进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

关键词: 社会责任规制; 对外直接投资; 影响机制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47218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026)

一、引言

全球化仍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为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 我国提出加快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 积极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FDI)以消除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实现世界共同繁荣。当前我国不少东部发达地区承接的 FDI 纷纷发生转移, 其中, 一部分逐渐向欧美发达国家回流, 还有相当一定比例的 FDI 源源不断转移到一些东南亚国家。学术界对其原因展开了深入讨论, 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根据波士顿咨询发布的报告, 2014 年, 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指数为 96, 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愈发接近, 且高于印度、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二是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广大中西部地区处于我国腹地, 虽然基础设施已经得到较大的改善, 但仍相对落后, 导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这使得外资企业宁愿转移到一些东南亚国家也不愿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三是政府主导作用尚未发挥。我国 FDI 一直呈现政府主导特征, 从空间上看, 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的政府作用发挥较弱。四是劳动力市场结构不完善。由于优质医疗、教育等资源的缺失以及服务业发展的滞后, 中西部地区很难吸引到发展亟需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些观点较好地解释了这一典型现象, 但是仍存在以下事实: 由于干部交流以及新发展理念的传播, 中西部地区似乎更倾向于高起点规划和构建本地产业体系, 即政府定位已经由招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 一些不符合环境保护、员工福利等标准的企业是很难进入的; 一些政府规制措施, 如企业为非户籍职工的社保缴费义务不再豁免也令相当多的企业不堪重负等。这些影响产业或企业转移的因素本质上属于社会责任规制。因此, 除了以上因素外, 社会责任规制是否也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

变量？进一步，我国外资转移现象是否意味着社会责任规制会抑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一些国外学者分别从社会责任规制的某一方面入手分析了其对 FDI 的影响，比如 Gross & Ryan(2008) 通过对日本的研究发现劳动者保护立法对于 FDI 的区位选择和规模有负面影响；Cole 等(2009) 以中国为例发现 FDI 往往流向政府效率较高、反腐成效较好的地区；Fredriksson 等(2003) 针对美国的研究表明，环境政策对于 FDI 的流动有着显著影响等。这些研究结论从理论上证明了社会责任规制对 FDI 的确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有益的探索和补充，即结合企业跨国经营主流理论，从社会责任规制的视角切入，通过构建计量模型以及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东道国社会责任规制对 FDI 是否存在影响？二是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东道国社会责任规制对 FDI 究竟是抑制还是促进？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基于成本效应的社会责任规制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机制与假说，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的样本、变量以及数据，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是进一步的验证与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社会责任规制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本驱动机制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是否是自发实现的问题仍存在争论，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责任实施需要政府规制。跨国公司作为全球价值链(GVC)的“链主”，通常可以任意对东道国的生产制造环节或配套厂商进行压榨，表现在不履行社会责任上，比如雇用童工、廉价工资、无视环保等。东道国对跨国企业进行的社会责任规制主要包括经济规制、社会规制、环境规制三个方面。

显然，社会责任规制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文认为，社会责任规制对 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成本驱动机制进行实现的。企业的生产成本实际上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显性的要素成本，另一部分则是隐性的交易成本。社会责任规制对于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影响方向是不一致的。一般来讲，如社会责任规制中对员工福利、环境保护等要求的提高可能更多的增加要素成本，而加强反腐、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等则偏向于降低交易成本。社会责任规制对于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具有行业，甚至是企业异质性。制造业企业通常对要素成本较为敏感，而服务业企业则对交易成本更为敏感，同样的社会责任规制措施或程度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可能并不相同。比如，提高员工基本福利水平、严格环境保护对劳动密集型或资源消耗型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的提升明显要大于知识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企业。即使是同一行业中员工工资水平不同的两家企业在东道国政府提高工人最低工资水平后其生产成本的变化方向和幅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同样，同一类社会责任规制的不同措施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也会产生差异。例如，对员工保护的措施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增加解雇成本、禁止使用童工、保障劳动时间等。不少研究发现，东道国劳动力市场越趋向于柔性（如解雇成本较低等），越能吸引 FDI 流入(Javorcik & Spatareanu 2005)。还有学者证实，限制劳动时间的规定会对 FDI 向风险型产业流入产生负面影响(Haaland et al. 2002)。

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制措施也会企业的生产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 FDI 的区位决策。以提高环保标准为例，一方面会提升企业使用环境、资源的价格，增加企业对环保设备的投资，从而使得企业要素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也可能减少东道国政府在环保领域的寻租行为，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Fredriksson et al. 2003)。有证据表明，环境规制的加强不利于吸引 FDI 流入(Hanna 2010)。但也有研究发现，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可以促进 FDI 流入(Elliott & Zhou 2013)。Kahouli 等(2014)认为环境规制对 FDI 流入的影响是积极的，但是却不显著。

经济规制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会通过税收、财政补贴等政策改变企业的要素使用成本,即内部成本的转移或外部化。比如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不少地方政府为吸引 FDI 往往通过免税、低价供地、生产补贴等形式展开竞争。二是通过制订政府权力清单、审批清单、简政放权或中央集权等措施改变经济自由度,从而影响企业的交易成本。Busse & Groizard (2008) 发现,经济规制较少的国家相对于规制较多的国家在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方面更有优势。反腐是社会规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政府治理效率,通常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进入门槛,直接减少交易成本,同时,也会间接影响企业的要素成本。从整体层面来说,对于增量 FDI,反腐程度越高,可能越有利于吸引 FDI 流入。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社会责任规制影响 FDI 流动,且对 FDI 区位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

三、样本、变量与数据

为了回答引言部分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本文将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本文选择的样本为经合组织(OECD)中34个国家(不含拉脱维亚)以及“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部分“展望五国”(印尼、阿根廷),总共40个国家,样本期为2005-2015年。选择的主要依据如下:(1)本文主要围绕“社会责任规制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因此,适合采用跨国数据;(2)样本国家基本属于市场经济国家,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影响因素与内在规律具有一致性;(3)样本国家分属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且包含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大国与小国、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内陆国家与沿海国家等多种特征,故样本选择较为全面;(4)样本跨度包含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周期,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繁荣、衰退以及之后的萧条、复苏,从而避免了因时间选择片面所可能产生的结论可靠性问题。

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FDI,主要包括两个角度:一是用 FDI 流入量指标(*fdi_inw*)表示本国承接别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二是由于数据所限,用美国制造业(*manuf*)、信息业(*infor*)、存款机构(*depos*)、金融与保险业(*finan*)、科学与技术服务业(*scien*)向其他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指标来表示各国承接不同产业 FDI 的情况。美国经济分析局在分行业统计中将存款机构、金融与保险业分开,类似于银行业与非银金融业的区别。数据来自于 OECD 数据库和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网站。

解释变量是社会责任规制。社会责任规制的内涵十分丰富,实证研究对其的处理一般有三种思路:(1)通过比较某种社会责任规制措施实施前后被解释变量的变化来说明社会责任规制的影响,这种方法巧妙回避了社会责任规制的定量描述,但是容易引起社会责任规制是否是充分不必要条件的质疑。(2)引入哑变量整体测度社会责任规制,但这种方法背后的内涵比较有限。(3)针对社会责任规制涉及的不同方面分别选取指标进行度量,本文主要采用该种思路。根据定义,社会责任是组织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包括企业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道德以及公共利益等方面,由经济责任、持续发展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构成。基于此,社会责任规制也大体应该包括经济、社会以及环境三个方面。本文用经济自由度指数(*freedom*)来衡量经济方面规制程度,数据来源为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用反腐指数(*corruption*)和劳动者合同解雇保护程度(*employ*)来表示社会方面规制程度,数据来源分别是世界银行以及 OECD 数据库;用单位国土面积碳排放量(*environment*)来测度环境方面规制程度,数据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指标计算得出。

除了社会责任规制,还有一些影响国际产业转移的因素得到了不少研究的证实,比如区位条

件、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开放程度、市场规模、平均工资等。这些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成本类(包括要素、环境两方面)以及市场类。考虑到社会责任规制等相关因素也会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要素成本,为了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选择以下四个控制变量:人力资本情况,用高等院校入学率指标(*enroll*)衡量;开放程度或出口依赖度,用货物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重(*export*)来度量;基础设施水平,用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internet*)来表示^①;市场规模,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代替,以上指标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四、实证分析

(一) 模型设定

为了实现本文的研究目标,这里将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基于上一部分对变量选择的考量,本文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FDI_{it} = \alpha_1 + \alpha_2 freedom_{it} + \alpha_3 corruption_{it} + \alpha_4 employ_{it} + \alpha_5 environment_{it} + \theta Z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i*代表国家或地区,*t*代表时间;*FDI*为代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被解释变量集,在本部分的回归中表示为*FDI*流入规模(*fdi_inw*),在下一部分表示为美国制造业(*manuf*)、信息业(*infor*)、存款机构(*depos*)、金融与保险业(*finan*)、科技服务业(*scien*)对外直接投资额;*freedom*、*corruption*、*employ*、*environment*为解释变量社会责任规制的四项指标;*Z*为控制变量集,包括高等院校入学率(*enroll*)、货物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重(*export*)、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internet*)以及国内生产总值(*gdp*); ε_{it} 是随机误差项。

(二) 基本回归

本文计算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发现基本都小于0.4,并未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经过Hausman检验($p=0.6294$),证实本文样本数据更支持随机效应回归模型。考虑到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双向因果等问题,最终本文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采取了两种方式:(1)逐个放入解释变量发现变量系数的符号没有发生变化且显著性检验情况一致;(2)考虑到可能存在时间效应,本文考察了所有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滞后一期的计量回归,结果依旧稳健。根据表1(见下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经济自由度指数与FDI流入规模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自由度指数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政府对经济社会责任的规制水平,涵盖了贸易政策、政府财政开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货币政策、资本流动和外国投资、银行业和金融业、工资和物价、产权、行业监管以及非正规市场活动(黑市)共10个方面,规制水平越差(好),经济自由度越低(高),该指数值越小(大)。回归结果表明,经济责任的规制水平越好,越能促进FDI流入,这一结论亦与不少文献观点一致(宗芳宇等,2012)。其主要通过四个机制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尤其是交易成本:一是经济自由指数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会通过较宽的准入限制、本地资源的自由转让等方面降低FDI的进入壁垒和生产成本;二是经济自由指数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一般经济制度环境相对稳定,从而减少制度更替的摩擦,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三是经济自由指数较高意味着企业产权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四是经济自由指数较高使得FDI企业与本土企业可以在市场上开展公平竞争等。

① 事实上,基础设施水平的衡量有很多指标,比如货物港口吞吐量、航空运输量、铁路里程数等,前两者从某种程度上与开放程度的一些指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后者的各国数据缺失较多,且更多的是一种内陆交通数据,故本文选择互联网用户指标,可以涵盖对内、对外的双向联络、互通程度。

第二,反腐指数与 FDI 流入规模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报告》各国控制腐败的指数是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衡量了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的社会关系,该指标的取值范围为(-2.5, 2.5),数值越大,说明控制腐败的成效越显著。该指标与治理指数中的其他方面,如法治指数、政府效率等具有较为明显的相关关系。回归结果表明,控制腐败的成效越好,越能够吸引 FDI 流入。理论界对此存在着不小的争议,有的观点认为,腐败程度越严重,对 FDI 就越有吸引力。本文的研究则支持相反的观点,因为在相关体制机制不完善的背景下,本土企业更容易依靠自己建立的非市场资源以弥补制度空隙(Dunning et al., 2008),进而获得竞争优势。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FDI 企业不得不以增加交易成本的方式去弥补制度空隙。之所以产生争议,可能会与 FDI 的产业特征、生命周期阶段等因素有关。

表 1 基于全样本的社会责任规制与 FDI 流入回归

变量	方程 1 <i>fdi_inw</i>	方程 2 <i>fdi_inw</i>	方程 3 <i>fdi_inw</i>	方程 4 <i>fdi_inw</i>	方程 5 <i>fdi_inw</i>
<i>freedom</i>	2.0569*** (0.5916)	1.6688*** (0.6496)	1.4872** (0.6556)	1.3247** (0.8445)	2.3773*** (1.9597)
<i>corruption</i>		0.2012*** (0.2836)	0.1280*** (0.3092)	0.1501*** (0.2759)	0.8922** (0.4176)
<i>employ</i>			-0.3039** (0.2178)	-0.3359** (0.2379)	-0.5629** (0.3692)
<i>environment</i>				-0.1048*** (0.2512)	-0.1556*** (0.302)
<i>enroll</i>	-5.2521*** (1.5470)	-5.1955*** (1.5315)	-5.7057*** (1.5223)	-6.0228*** (1.3809)	-4.9227** (2.5647)
<i>export</i>	-1.8742 (1.1518)	-1.8775 (1.1968)	-1.5114 (1.0561)	-1.3281 (1.7114)	-2.0413 (1.5899)
<i>internet</i>	1.4048** (0.6233)	1.4034** (0.7041)	1.5308** (0.7141)	1.5782** (0.6963)	-0.3894 (1.4806)
<i>gdp</i>	0.1771*** (0.0065)	0.1777*** (0.0071)	0.1768*** (0.0070)	0.1767*** (0.0075)	0.1611*** (0.0106)
<i>_cons</i>	2.3234** (1.1165)	2.3579** (1.1370)	3.3333*** (1.3930)	3.7143*** (1.1134)	6.4887*** (2.2519)
Wald 检验	3289.82 [0.0000]	4159.74 [0.0000]	3954.26 [0.0000]	6246.39 [0.0000]	2776.36 [0.0000]
AR(1) 检验	-2.1404 [0.0323]	-2.1295 [0.0332]	-2.1314 [0.0331]	-2.143 [0.0321]	-2.0605 [0.0393]
AR(2) 检验	1.1131 [0.2656]	1.1097 [0.2671]	1.1186 [0.2633]	1.1126 [0.2659]	0.7752 [0.4382]
Sargan 检验	16.3635 [0.4982]	16.0240 [0.5221]	16.2894 [0.5034]	16.5079 [0.4882]	19.4019 [0.306]
国家固定效应	Y	Y	Y	Y	Y
观测值	400	400	400	400	400
国家数目	40	40	40	40	40

注:实证结果均由 stata12 计算并整理得出。(1)*** ** * 分别表示 1% 5% 和 10% 水平上的显著性;(2)圆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差;(3)方括号内的数字是 p 值;(4)Wald 检验的原假设是变量是外生的,Sargan 检验的原假设为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4)方程 5 中的解释变量为方程 4 的滞后一期。

第三,劳动者合同解雇保护指数与 FDI 流入规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OECD 数据库公布的劳动者合同解雇保护指数反映了社会责任规制中员工福利水平。但需要说明的是,该指数越小表明保护程度越高。回归结果证明,劳动者合同解雇保护程度越高,越能够吸引 FDI 流入。以中国为例,近年来我国劳动者福利保障要求和执行力度日益提高,但吸引利用 FDI 的规模仍然是呈现逐年扩张的态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劳动者福利保障标准的提高,FDI 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使用特征均会发生变化,比如劳动力密集型 FDI 会退出,而资本密集型 FDI 会进入;对要素成本更为敏感的制造业 FDI 会退出,而对此相对不敏感的服务业 FDI 会进入,最后,由于社会制度环境的完善,交易成本的下降,FDI 的净流入仍然会增加。

第四,单位国土面积碳排放量与 FDI 流入规模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规制并不仅仅反映在治污支出方面,污染物排放强度更能反映环境规制的实际效果。单位国土面积碳排放量是环境规制众多指标中规制力度最大、也是最难达到目标的指标,反映了环境规制的真正强度。结果表明,单位国土面积碳排放量越小,环境规制的力度越强,FDI 的流入规模就越大。这看似与理论相悖,如“污染天堂”假说,实际上却符合理论预期:其一,“污染天堂”假说似乎具有理论合理性,但是在经验分析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支持(Eskeland & Harrison 2003);其二,“污染天堂”假说主要针对的是高污染行业,其忽略了行业环境消耗异质性特征;其三,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本文的研究样本大多数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研究结论与周长富等(2016)的研究基本一致。

第五,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是:(1)高等院校入学率与 FDI 流入规模显著负相关。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是高等院校入学率并不能完全代表人力资本水平,很多 FDI 企业对职业教育水平更加敏感,比如降低了培训成本,不同类型教育在资源分配方面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形;二是人力资本对 FDI 流入的影响通常存在门槛效应,达到门槛之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只会进一步推高劳动力成本;三是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人才往往向少数发达国家、发达城市集聚,本国或本地区通过高入学率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可能并未能为己所用。(2)货物和服务出口占 GDP 比重与 FDI 流入规模之间负相关,但不显著。这主要由于两大效应的同时存在:一是出口与 FDI 之间的替代或挤出效应,二是开放程度和对外依赖度的提高也会增加对 FDI 的吸引。(3)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国内生产总值与 FDI 流入规模显著正相关。即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市场规模的扩大将有助于吸收利用 FDI。

(三) 分组回归

考虑到社会责任规制与 FDI 流入之间的关系可能还会受到国家经济规模、地理位置以及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将样本国家进行分组回归:(1)按国内生产总值是否大于等于 1 万亿美元将样本国家分为大国、小国两类;(2)按国土是否拥有海岸线将样本国家分为沿海国家和内陆国家;(3)按世界银行的分类将样本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由于样本中内陆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数量非常少,不适合进行系统 GMM 回归,表 2(见下页)仅列出基于大国、小国、沿海国家以及高收入国家的样本回归结果。

第一,经济自由度指数与 FDI 流入。(1)无论大国还是小国,经济自由度指数与 FDI 流入规模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系数角度来看,在社会责任规制各方面中,对大国和小国 FDI 流入规模影响最大的均是经济责任规制水平。(2)拥有海岸线的沿海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与 FDI 流入规模之间的关系为正,但不显著,说明经济责任规制水平并不是这些国家吸引 FDI 的最重要因素。

第二,反腐指数与 FDI 流入。(1)从小国、沿海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角度来看,腐败控制程度均与 FDI 流入规模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点在高收入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2)对于大

国而言, 反腐指数与 FDI 流入规模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从某种程度上讲, 对于 FDI 企业来说, 本土企业通过弥补制度空隙获得资源优势并非不可逾越, 另外, 大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产业体系的多样性, 可能会使得反腐与 FDI 流入规模之间的关系相对复杂。

表 2 基于分组样本的社会责任规制与 FDI 流入回归

变量	小国 <i>fdi_inw</i>	大国 <i>fdi_inw</i>	沿海 <i>fdi_inw</i>	高收入 <i>fdi_inw</i>
<i>freedom</i>	2.8452 *** (0.5869)	8.4289 ** (13.4312)	0.4103 (1.2674)	0.1753 (0.9930)
<i>corruption</i>	0.4210 * (0.2236)	-0.5864 (5.0299)	0.4218 * (0.2498)	0.8507 ** (0.3084)
<i>employ</i>	0.2123 (0.1429)	-6.3699 * (4.0859)	0.4035 (0.4595)	-1.7578 *** (0.4079)
<i>environment</i>	-0.3248 *** (0.0544)	-1.0393 *** (2.3428)	-1.5704 *** (0.3233)	-0.0859 (0.1660)
<i>enroll</i>	0.7836 (0.7615)	-49.0351 ** (15.6626)	-13.6965 *** (1.6400)	-4.7096 *** (1.2356)
<i>export</i>	2.8698 *** (0.3547)	37.5403 * (15.0886)	9.2075 *** (2.0039)	0.7739 (0.8359)
<i>internet</i>	-0.3119 (0.4649)	-7.6736 (7.6075)	2.5560 * (1.0020)	0.6852 (0.9605)
<i>gdp</i>	0.1742 ** (0.0560)	0.3154 *** (0.0634)	0.2205 *** (0.0075)	0.1590 *** (0.0052)
<i>_cons</i>	-4.5707 *** (0.5754)	30.2953 * (15.6629)	4.5747 * (1.8977)	5.9999 *** (1.6001)
Wald 检验	1617.21 [0.0000]	603.94 [0.0000]	6142.62 [0.0000]	25509.43 [0.0000]
AR(1) 检验	-1.7224 [0.085]	-0.9739 [0.3301]	-1.8792 [0.0602]	-1.7344 [0.0828]
AR(2) 检验	0.8877 [0.3747]	-0.4389 [0.6607]	0.8735 [0.3824]	0.8244 [0.4097]
Sargan 检验	19.0867 [0.3236]	3.7132 [0.9997]	20.0533 [0.2715]	22.4247 [0.1689]
国家固定效应	Y	Y	Y	Y
观测值	250	150	340	340
国家数目	25	15	34	34

注: 实证结果均由 stata12 计算并整理得出。(1) *** ** * 分别表示 1% 5% 和 10% 水平上的显著性; (2) 圆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差; (3) 方括号内的数字是 p 值; (4) Wald 检验的原假设是变量是外生的, Sargan 检验的原假设为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

第三, 劳动者合同解雇保护指数与 FDI 流入。(1) 对于大国和高收入国家, 劳动者合同解雇保护指数与 FDI 流入存在着显著负相关关系, 说明劳动者合同解雇保护及员工福利保障程度越高, 越能够吸引 FDI 流入。由于市场规模较大, 劳动者福利保障要求的提高将使得进入这类国家的 FDI 更容易进行产业结构转换, 进而降低了 FDI 企业对劳动合同解雇保护影响生产成本的敏感性, 导致 FDI 净流入增加。(2) 对于小国和沿海国家, 劳动者合同解雇保护指数与 FDI 流入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不显著。说明劳动者福利保障规制并不是影响这类国家吸引 FDI 的主要因素。

第四,单位国土面积碳排放量与 FDI 流入。除高收入国家外,无论是大国、小国,还是沿海国家,单位国土面积碳排放量与 FDI 流入规模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会促进 FDI 流入。这一结论亦表明,环境规制是社会责任规制中影响 FDI 流入的主要变量,当国家或地区处于工业化后期时,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将会导致 FDI 流入的质与量同时提升。

五、进一步讨论:社会责任规制与 FDI 产业结构

为了验证社会责任规制可能会对不同产业的 FDI 流入造成的不同影响,这里将各国社会责任规制与承接美国不同行业 FDI 流入进行回归分析。根据表 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表 3 社会责任规制与 FDI 流入产业结构回归

变量	方程 1 <i>manuf</i>	方程 2 <i>infor</i>	方程 3 <i>depos</i>	方程 4 <i>finan</i>	方程 5 <i>scien</i>
<i>freedom</i>	2.1135 (1.4184)	2.2556*** (0.6948)	2.2135*** (0.1850)	7.2547*** (2.5333)	1.3925** (0.5664)
<i>corruption</i>	-0.8366* (0.3537)	0.6190*** (0.2172)	-0.6256*** (0.0881)	5.7605*** (1.0941)	0.7322** (0.3479)
<i>employ</i>	0.5438*** (0.6759)	-0.4604** (0.2237)	-1.6554*** (0.0796)	-2.3156*** (0.8006)	-2.4411*** (0.3457)
<i>environment</i>	1.0574*** (0.2753)	-0.1043 (0.0875)	0.1793*** (0.0525)	-0.8130*** (0.1786)	-0.0825 (0.0805)
<i>enroll</i>	-9.3988*** (2.2927)	11.2901*** (1.0105)	-0.8757** (0.3544)	2.7029** (2.0833)	0.0747** (0.5680)
<i>export</i>	0.0708*** (0.0105)	0.0069* (0.0041)	-0.0200*** (0.0059)	-0.0061 (0.0108)	0.0251*** (0.0036)
<i>internet</i>	8.2536*** (1.3126)	0.0822* (0.4703)	-0.0526 (0.2510)	-13.1436*** (2.3457)	-1.9196*** (0.5366)
<i>gdp</i>	0.0194 (0.0142)	0.0392*** (0.0067)	0.0235*** (0.0034)	0.0643*** (0.0100)	0.0990*** (0.0099)
<i>_cons</i>	-2.7706 (2.2124)	-4.5240*** (1.1221)	4.3132*** (0.2399)	6.7177** (3.3311)	5.4300*** (0.9732)
Wald 检验	147665.91 [0.0000]	401432.39 [0.0000]	951584.50 [0.0000]	242496.86 [0.0000]	57585.88 [0.0000]
AR(1) 检验	-2.969 [0.003]	-1.9722 [0.0831]	-1.4679 [0.0421]	-2.3836 [0.0171]	-1.7545 [0.0793]
AR(2) 检验	-0.2388 [0.8112]	1.7329 [0.1159]	-0.7935 [0.4275]	1.0913 [0.2751]	1.3385 [0.1807]
Sargan 检验	25.8036 [0.0781]	27.1952 [0.0553]	20.9745 [0.2274]	22.3631 [0.1712]	23.6489 [0.1293]
国家固定效应	Y	Y	Y	Y	Y
观测值	350	350	350	350	350
国家数目	35	35	35	35	35

注:实证结果均由 stata12 计算并整理得出。(1)*** ** * 分别表示 1% 5% 和 10% 水平上的显著性;(2)圆括号内数字是标准差;(3)方括号内数字是 p 值;(4)Wald 检验的原假设是变量是外生的,Sargan 检验的原假设为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

第一 经济自由度指数与 FDI 流入。(1)经济自由度指数与制造业 FDI 流入规模相关关系

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经济责任规制水平并不是影响制造业 FDI 流入的主要因素,但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提高也会促进制造业 FDI 流入。(2) 经济自由度指数与信息、存款机构、金融与保险以及科技服务等服务业 FDI 流入规模之间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 FDI 对于东道国经济责任规制水平更为敏感。(3) 除科技服务业外,经济责任规制水平是社会责任规制各变量中影响服务业 FDI 流入最重要的变量。

第二,反腐指数与 FDI 流入。(1) 反腐指数与制造业、存款机构 FDI 流入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可能与制造业企业以及存款机构发展所需要的关键性资源(如土地、环境资源、存款等)有不少掌握在东道国政府手里有关。在体制不完善的背景下,通过腐败渠道获得这些资源的成本要小于从公开市场获得的成本,故腐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促进制造业与存款机构 FDI 流入。(2) 反腐指数与信息业、金融与保险业以及科技服务业 FDI 流入规模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为正。信息、金融与保险以及科技服务等服务业企业的核心生产要素更多的掌握在企业手中,对东道国政府的依赖性相对较小。这类企业更偏好公开、透明、高效的法治型政府,因而控制腐败程度越高,越能够吸引相关 FDI 流入。

第三,劳动者合同解雇保护指数与 FDI 流入。(1) 劳动者合同解雇保护指数与制造业 FDI 流入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为正,说明劳动者福利保障要求的提高会导致制造业 FDI 流入的减少,这类现象已经在我国的广东等地普遍出现。其原因主要是,制造业对于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更为敏感,劳动者福利保障要求的提高会显著增加企业的劳动力使用成本,反之则反是。(2) 劳动者合同解雇保护指数与信息、存款机构、金融与保险、科技服务等服务业 FDI 流入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对劳动力使用成本不敏感所致相反,社会制度的完善会刺激服务业 FDI 的流入。

第四,单位国土面积碳排放量与 FDI 流入。(1) 单位国土面积碳排放量与制造业、存款机构 FDI 流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环境规制力度越强,制造业与存款机构 FDI 的流入规模就越小。制造业利用环境要素相对较多,不少经验研究和典型事实均表明,环境规制力度的提升将导致一些污染较严重的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进而外迁。存款机构可能与制造业企业存在共生关系,制造业 FDI 流入的减少势必也会导致存款机构 FDI 的减少。(2) 单位国土面积碳排放量与信息、金融与保险、科技服务等服务业 FDI 流入之间的关系为负,但只有金融与保险业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由于环境要素使用较少,环境规制对其生产成本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环境规制不是影响信息与科技服务业 FDI 流入的主要因素。信息与科技服务业是人才密集型产业,人才对生活环境的的要求使得环境规制的力度增强会降低企业获取人才要素的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 FDI 流入。环境规制对于金融与保险业 FDI 流入的影响更为显著,规制力度越强,FDI 流入越多,这可能与制造业以及存款机构 FDI 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所致。

六、小结与启示

当前,我国提出要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本文从社会责任规制视角切入,研究了社会责任规制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 从总体上看,东道国政府在经济自由度、反腐败、劳动者福利保障、环境规制四个方面的社会责任规制促进了 FDI 流入。(2) 在不同类型的东道国,如大国、小国、沿海国家、高收入国家,社会责任规制对 FDI 流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3) 社会责任规制程度的提高抑制了制造业 FDI 的流入,但却有助于促进服务业 FDI 的流入。

根据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一些启示:(1)当前我国出现了不少外资撤离事件,这实际上属于短期现象,无需担心,况且流出的FDI大多属于低端制造业,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近年来我国环境规制和劳工保护力度的加强造成该类制造业企业要素成本急剧上升所致。部分中高端制造业回流至发达国家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经济自由度、反腐成效等社会责任规制因素的影响。(2)对社会责任规制水平的提高可能会造成FDI流出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从长期来看,社会责任规制水平的提高反而会促进FDI的流入,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由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换,由此还会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价值链升级。(3)目前,我国为了更好地吸收利用FDI,从社会责任规制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大力优化经济责任的规制水平,即促进经济自由。(4)要吸引更多的现代服务业FDI流入,主要需要对经济责任规制、反腐、劳动者福利保障等方面进行加强和优化。

参考文献:

宗芳宇、路江涌、武常岐 2012 《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经济研究》第5期。

周长富、杜宇玮、彭安平 2016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我国FDI的区位选择?——基于成本视角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第1期。

Busse, M. & L. Groizard, 2008,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gulations and Growth," *The World Economy*, 31(7) pp. 861-886.

Cole, M. R. Elliott & J. Zhang, 2009, "Corruption, Governance and FDI Location in China: A Province-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5(9), pp. 1494-1512.

Dunning, J. H. & S. Lundan, 2008, "Institutions and the OLI Paradigm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5(4) pp. 573-593.

Elliott, R. & Y. Zhou, 2013,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uc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55(1) pp. 141-158.

Eskeland, G. S. & A. E. Harrison, 2003, "Moving to Greener Pastures? Multinationals and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0(1) pp. 1-23.

Fredriksson, G. A. List & L. Millimet, 2003,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Inbound US FDI: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7(7-8) pp. 1407-1430.

Gross, M. & M. Ryan, 2008, "FDI Location and Size: Does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Matter?"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38(6) pp. 590-605.

Haaland, J. J. Wooton & G. Faggio, 2002, "Multinational Firms: Easy Come, Easy Go?" *Finanz Archiv*, 59(1), pp. 3-26.

Hanna, R., 2010, "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DI: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US-Based Multinational Firms," *Applied Economics*, 2(3) pp. 158-189.

Javorcik, B. & M. Spatareanu, 2005, "Do Foreign Investors Care about Labor Market Regulations?"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1(3) pp. 375-403.

Kahouli, B. A. Omri & A. Chaibi, 2014,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Gravity Equations," IPAG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责任编辑 江静)

Abstracts

A Study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 Construction: Its Framework, Key Issues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LIU Zhi-biao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s a major symbol and a strategic choice for large developing economies in their way to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such subsystems as the industrial system, market system, distribution system, regional development system, green development system, open system,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al system. As an overall framework, what should be done is sticking to a principle as a guiding line, to build an innovation-directed, coordinated industrial system and a “three-tiered” economic system, in which, strengthening the real economy and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n supporting this system and framework. To establish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s a great policy in development, a big achievement in theory and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pplied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ig “One” and the Many as Well as the General Intellect and the Multitude: An Interpretation of Virno’s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ZHANG Yi-bing

In the capitalist social reality of post-Fordism, the plurality of the multitude is still ruled by the oneness. But this new “One” no longer makes its appearance through the compulsive oneness of a state, nor is it a collectivity through the ideology. It, instead, becomes universality of a new kind: a language, intelligence and ability that are shared by everyone, and appears as the general intellect—a way of existence for the multitude. The “One” is quite different in effect from the oneness of both custom and conception, for it does not replace the plurality with oneness any more, but tolerates the otherness of the Many, leaving the multitude subjective further to the rule of post-Fordist capital.

Will Social-Responsibility Regulation Inhibit FDI?

XIAO Hong-jun, CHENG Jun-jie, HUANG Su-jia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social-responsibility regulation on FDI and its mechan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st driving. By constructing and tes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t find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responsibility regulation, which includes economic freedom, anti-corruption, employment welfar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DI inflow. And yet there are such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ries as big, small, coastal and high income countries.

While tightening social-responsibility regula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attracting FDI in manufacturing , it does help promote FDI inflow in service industry. Our point is that ,with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ocial-responsibility regulation , China can expand the scale of FDI an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FDI , which will help real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value chain upgrading.

On Strategy for Emission Reduction in a Supply Chain: With a Consider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Cost and Free Emission Quota

WU Peng , YIN Yi-xi

A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more worried about ,the right for carbon emission becomes a new gateway for commercial value ,so is considered as an operating cost for an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ptimal decision on emission reduction for organizations considering emission costs under different modes of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and different free emission quota allocation schem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entralized supply chain has lower average emission but higher total emission compared with decentralized supply chain; the upstream firm in a decentralized supply chain has higher tendency to reduce more emission; if free emission quota is allocated according to the emission intensity rather than emission capacity , then the supply generates lower both average and total emission , and any emission reduction decision can be partially adjusted by changing its free emission allowance; an emission reduction decision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supply chain partners.

From Economic Theory , Legal System to National Strategy: A Three-Dimensional View of Anti-monopoly

WANG Xian-lin

Antimonopoly or competition policy , as an economic phenomenon , is primarily a subject matter for economic study , then a legal system and its enforcement , and furthermore a national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dimension of economic theory , antimonopoly is an instrument of correcting market failure; in the dimension of legal system , antimonopoly is a system design of maintaining 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 order; and , in the dimension of national strategy , antimonopoly is a whole project of protecting national interest in globalized competition.

On the CPC’s Choice of Goal and Model in Fulfilling “National Unity”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Establishment: Review and Interpretation of “External Factors”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QI Peng-fei

In 1949 ,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et up its goal and model of national unity , namely , a “unitary republic state” —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which is a remarkable and distinctive feature of Chinese Marxist theory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 of maintaining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while exercising democratic centralism. This is a historical choice made by the CPC after its exploring and practicing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 and a historical sublation of the original goal and model , made when the CPC was first founded and then exercised for a long time: copying the goal and model of “national unity” ,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Federalism” with the “Soviet Union Model” as the bases and major features. The reasons why the CPC was driven to take this choice are complex and manifold , with some being subjective and others objec-